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的战略思想与苏联的对外政策

张盛发

本文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提出了在苏联一国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根据斯大林的战略思想，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基点可以归纳为：巩固战争的胜利成果，帮助和确保在东欧国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使它们与苏联一起形成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并成为苏联的“安全带”；维持与西方国家的有限合作；支持外国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但以不妨碍苏联与西方的合作和不引起苏联与西方的冲突为限。这一外交政策，就是要为苏联国内进行共产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提出了在苏联一国进行共产主义建设的理论。在斯大林看来，在苏联一国进行共产主义建设之所以可能，首先是新战争的威胁并不实际存在，其次是战后苏联可与西方国家继续合作，再次是在苏联的欧洲边缘可以建立一条“安全带”。

根据斯大林的战略思想，苏联战后对外政策的基点可以归纳为：巩固战争胜利的成果，帮助和确保在东欧国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使它们与苏联一起形成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并成为苏联的“安全带”；维持与西方国家的有限合作；支持外国的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但以不妨碍苏联与西方国家合作和不引起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军事冲突为限。一言以蔽之，这一外交政策，就是要为苏联国内进行共产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它与斯大林的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下面就斯大林的战略思想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实施情况试加论述。

一、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苏联以胜利者的姿态从战争的瓦砾中走了出来，但它却在大战中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因而国内经济的恢复和重建便成为苏联战后的首要任务。同时也决定了苏联在对外事务中决心继续与西方国家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

所以，斯大林在战争结束后指出，苏联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医治战争创伤，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并争取新的经济高涨。斯大林断定，在苏联一国内建设共产主义是可能的。同时还宣布，“苏联今后也将忠于自己的政策——和平与安全的政策，各民族平等和友好的政策”^①

对于苏联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关系，斯大林认为，苏联可以与它们继续保持合作。斯大林这一估计与他本人有关战争问题的观点是有着密切关系的。斯大林在战后的答记者问中曾经多次以坚定的口吻否定了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新的战争有两层意思，一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它们是不可避免的；二是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的战争。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它们与苏联战争的可能性，理由就是资本

^①《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6、506、510页

主义国家间战争的目的是取得对其它国家的优势，而与苏联进行战争，则涉及到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但是苏联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①。既然其时，德国和日本已被打败，那末，资本主义国家间在短期内当然不会发生新的战争。斯大林对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保持合作的估计，是与他关于新战争的论断相吻合的。

此外，斯大林这一估计的另一根据就是战争后期的雅尔塔会议公报，苏、美、英在公报中共同表示，在今后的和平时期，要保持并加强团结一致，继续增进合作与了解。看来，斯大林并不认为雅尔塔会议的精神会那么快就为西方国家所遗忘。他对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持乐观态度。

但是战后国际政治形势的发展却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缝，并在如何制定对意、芬、保、罗、匈和约，处理德国问题和对待东欧国家的政体问题上，矛盾越来越大。

1946年2月，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在致华盛顿的电文中，提醒政府注意：苏联对西方持敌视态度，威胁美国的重大利益，并认为，苏联“与理智的逻辑毫不相通”，“对武力的逻辑”却极其敏感，只有当遇到“强硬抵抗”时，它才会退却。年底，杜鲁门总统的助手克拉克·克利福德在递交给总统的有关苏联威胁的秘密报告中认为，“苏联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行动”，“它的对外政策的每一步骤都是仔细筹划并与其它方面的行动相联系的”。他指出，美国必须与苏联针锋相对，“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不论是有关欧洲的、近东的或者是远东的，都必须服从华盛顿的对苏政策”。^②

这说明在世界范围内，美国已经开始把苏联视作它的对手。

为了实现全球战略，美国强烈反对苏联继续驻军伊朗北部和在海峡地区获取军事基地的企图，并表示，必要时以武力相对抗。

苏联为了维持与美国的关系，也鉴于本身的力量有限，在驻军伊朗和海峡要求问题上忍痛作了退却，满足了美国的要求，并对与美国合作继续进行执着的追求。

1946年9月，斯大林在答记者问中表示，“和平合作的可能性不仅不会减少，甚至能够增加。”^③10月，斯大林否定了关于美苏关系日益紧张的看法。^④两个月后，在与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的儿子谈话中，斯大林表示，美苏和平相处，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完全可以实现的”。^⑤

即便是在标志着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杜鲁门主义出台后，斯大林还是对苏联与美国的合作持既定的观点，并为此不惜容忍英、美对希腊共产党的镇压行动。

1947年4月初，也就是杜鲁门主义问世尚不到一个月，斯大林在与美国共和党人的谈话时表示，苏联和美国两种经济制度战后能够彼此合作，“如果有合作的愿望，那么，尽管经济制度不同，合作是完全可能的。”^⑥

只是在冷战逐步升级后，苏联对它与美国的合作的态度才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以往强调“合作”转变为侧重于“共处”。1948年5月中旬，即全面封锁柏林前，斯大林在“对华莱士先生的公开信的答复”中说：“苏联政府认为，尽管经济制度和思想体制不同，但是这些制度的共处，以及美苏分歧的和平解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为了普遍和平的利益也是绝对必要的。”^⑦

① 《斯大林文集》第623页~624页

② 陶布曼《斯大林对美国的政策》，纽约，伦敦1982年，第130页

③④⑤⑥⑦ 《斯大林文集》第510，511，516，523页

虽然斯大林严词谴责美、英不思与苏联合作,但它却希望双方能和平共处。1952年4月,斯大林在与《真理报》记者谈话中认为,“只要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①直至斯大林逝世的前几个月,斯大林在答《纽约时报》记者问中,仍然表示,“不能认为美国和苏联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两国今后也能够和平相处。”^②但是,杜鲁门政府并没有响应斯大林的呼吁,在对苏联政策上美国继续保持强硬的姿态。

当然,斯大林虽然希望与美国保持合作,但他却精明地把握着合作的尺度。他可以撤军伊朗,放弃对海峡地区的要求,限制希腊和西欧国家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对民族解放运动采取消极的态度。但他决不会让美国等西方国家染指被其视为苏联“安全带”的东欧地区,原因很简单,东欧对苏联的安全有着生死攸关的利害关系。所以,当美国抛出“杜鲁门主义”后,苏联立即不失时机地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当美国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时,苏联马上还以颜色,与东欧国家分别缔结了双边经济协定。当美国与西欧国家建立北约组织后,苏联立即针锋相对,与东欧国家组建了华约组织。希望“合作”,但也不怕对抗,一切视是否对苏联本国安全有利而定。可以说,这是苏联对美国的既定方针。

与苏联对美国的政策相同,战后,苏联同样也希望能与英国继续维持合作关系。但是由于两国对外政策大相径庭,又由于英国与美国一样,对苏联奉行遏制政策,所以,战后苏联与英国的关系也是愈益紧张。

1945年9月,在伦敦第一次外长会议上,苏联曾提议三大国对意属殖民地实行托管,但遭到了在地中海拥有战略利益的英国的强烈反对。在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承认问题上,英国同美国一起也同苏联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伦敦外长会议一个月后,英国外相贝文即暗示,“英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不可想象的。”^③这给英苏关系蒙上了浓厚的阴影。

1946年3月,已经下野的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斯大林对此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认为“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散播纠纷种子,使它们难以合作”,“丘吉尔先生的方针是进行战争的方针,即号召同苏联开战”。斯大林并且认为,丘吉尔不是“孤独”的,在英国和美国都有朋友。^④丘吉尔的演说发表后,曾有一些工党议员在英国下院提出动议,认为演说可能损害英美苏的友好关系和平事业,但是艾德礼首相中断了对该动议的讨论,既没有谴责这一演说,也没有表示异议,这就引起了苏联的不满,可见斯大林说丘吉尔有他的朋友,完全是有所指的。虽然如此,在后来答英国记者问中,斯大林还是“确信苏联和英国之间能够建立友好关系。”^⑤

但是英国却无意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1946年12月,英国外相贝文在发表广播讲话时表示,英国并“没有与谁结盟”。这一讲话立即在苏联引起了轩然大波。1947年1月,《真理报》发表题为《贝文宣布废除英苏互助条约》的编辑部文章,责问贝文是否忘记了有效期为20年的英苏同盟条约。英国政府急忙作了澄清性的表示。可是苏联对英国的戒意却已经愈来愈深。

1948年3月,英国与法、荷、比、卢缔结了布鲁塞尔条约,1949年4月,英国又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年还与美国签订了在英国领土上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协定。英国的行动表明,英国决心以英美联盟为基础,联合西方国家共同对抗苏联。

①②《斯大林文集》第673、679页

③B·A·雷日科夫,《苏英关系》,莫斯科1987年第108~109页

④《斯大林文集》第497~498页

⑤《斯大林文集》第509页

苏联对此予以强烈抨击。1949年4月，苏联指责英国参加北约违背了1942年的英苏同盟条约，也违反了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但英国回答说，北约与英苏条约并不矛盾，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至此，英苏关系已经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与苏联与美英两国的关系不同，战后苏联与法国并没有立即拔剑相向。从法国方面讲，它有过一段在战时被德国占领的屈辱史，战后它要同德国进行清算的欲望更强烈，加之它与德国直接接壤，对德国的戒心更重。又由于它是一个不同与美、英、苏那样的战胜国，在处理战后问题时，不拥有三大国那般的权利，在某些方面甚至受到一定的轻视。所有这些反映在外交舞台上，特别是对苏关系上，法国就不如英国那样咄咄逼人。就苏联方面而言，战后其与美英两国的关系已经紧张化，它当然不愿在大国的行列里再为自己增加一个对手，更何况法国的情况有别于英美。此外，历史上法俄两国曾有过较好的合作关系。这些因素在苏联的对法政策中当然不会不予以考虑。

事实上，战后初期，在某些国际问题上，苏联和法国的立场比较接近和一致，并且还有过合作。

1946年夏，在巴黎外长会议上，苏联支持法国要求讨论鲁尔命运问题的建议。两国都主张对德国制定一项严厉的赔偿计划。在意大利赔偿问题上，苏联要求获取1亿美元的赔偿，法国表示支持。同样，苏联也同意法国有权从德国获得必要数量的煤。虽然法国没有参加对意停战协定，但苏联赞同法国参加对意和约的谈判。在同年夏天的巴黎和会上，苏联支持法国提出的关于的里雅斯特国际化的建议和意南边界的方案。在划分法意边界时，法国获得了阿尔卑斯山的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地段，并作为四大国之一，分享了俘获的意大利船只。^①另外，在评价西班牙佛朗哥政权问题上，两国的立场也是接近的，都主张在西班牙建立一个临时共和政府。

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和两个阵营的出现，法国还是发现它的对外利益更多地是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相一致，而不是苏联，于是法国逐渐向美国和英国靠拢。法国接受了“马歇尔计划”，参加了北约组织，并同意将德国的法占区与美英的双占区合并。

1950年5月，法国外长舒曼与美国和英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指称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性的大国”。昔日的西方盟国，清一色地通通变成了苏联的敌手。

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德国问题。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对战败的德国如何处理是苏联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1945年和1946年，斯大林曾亲自阐述了苏联对德国问题的政策，他表示，苏联“既不算肢解德国，也不打算消灭德国。”“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在于使德国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这是“确立巩固的持久和平的最重要保证之一”。为了使德国不再成为世界各国的军事威胁，“应当在实际上根除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残余”。斯大林还认为，应当恢复德国的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②可见，苏联对德政策的重心，就是要使德国今后不复拥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能力。其着眼点也是本国的安全。此外莫洛托夫在1947年3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提出了建立全德临时政府的建议。

但是彻底根除法西斯主义残余和民主化的标准，在苏联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不过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建立全德临时政府的问题，大国间的歧见同样很深。美国就认为实行建

^①A·A·鲍里索夫，《苏联与法国：60年外交关系》莫斯科，1984年，第117~118页

^②《斯大林文集》第456，509，512页

立全德临时政府的选举是“不必要的”，法国则表示“为时尚早”。^①所以，美、英、法、苏在自己的德占区内，只能是各行其是。不久，德国问题就演变成冷战的焦点，从这里爆发了著名的“柏林危机”，此后，苏联和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的僵硬对立，终于导致了两个德国的出现。

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

苏联战后的外交战略之一，就是利用红军在东欧对法西斯残余力量的追击，通过帮助和支持东欧国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把苏联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拓展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同时把东欧各国变成苏联的“安全带”。

1946年3月，斯大林在评论丘吉尔“铁幕”演说时，明确表示要把在东欧国家建立对苏友好政府当作维护苏联本国安全的基础。斯大林并没有直接否定丘吉尔把东欧国家说成是苏联势力范围的观点，而是强调，“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于苏联抱着善意态度的政府”，“这是和平的愿望”，并非“扩张倾向”。理由是，“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是因为这些国家内当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②这就是斯大林的“安全带”理论。它把本国安全的基础延伸到邻国，其实质无非是以本国安全为借口，把东欧国家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纳入自己的轨道。

正是基于这种“安全带”的理论，苏联在东欧国家体制问题上，寸步不让。早在雅尔塔会议时，当美国提出解散卢布林的波兰临时政府，在成立国务委员会基础上，另建临时政府时，苏联就断然予以拒绝。1945年9月的外长会议上，当美国要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改组或辞职时，苏联同样表示坚决反对。当东欧国家内部政局动荡，人民民主政权受到威胁时，苏联又全力支持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予以反击（如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月事变），使东欧国家政府中的力量对比，由以共产党为主的多党联合政权，逐渐转变为共产党的一党统治。

此后，苏联便开始着手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与东欧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关系，试图以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力量来抗衡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以保障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安全。

1947年至1948年，苏联分别与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签署了双边贸易条约，与波兰签订了换货协定。1949年4月，与阿尔巴尼亚缔结了苏联以信贷方式向阿提供设备和物资的协定。1950年4月，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订立了贸易和支付协定。而早于1945年苏联就与南斯拉夫达成了换货协议。1947年至1949年苏联又与东欧国家签订了双边科技合作协定。

随着冷战的不断升级，苏联在1948年2月~3月，先后与罗、匈、保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苏联与捷、波、南则早在战时和战争后期就订立了类似的条约。而东欧国家间也在1947年~1949年中，互相订立了友好合作条约。整个4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国家共签署了35个这样的条约，从而构成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相互保障的安全体系。

1949年1月，由双边经济贸易协定联结起来的苏联东欧间的经济联系演化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共同体——“经互会”。而苏联东欧国家间的友好互助条约，则在1955年由双边条约发展为阿、保、匈、东德、波、罗、捷、苏八国多边条约，即“华沙条约”。

至此，苏联孜孜以求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和苏联的“安全带”得到了加强和保障。

^① 葛罗米柯和波诺马廖夫，《苏联对外政策史》，1945~1980年，莫斯科，1981年，第二版，第51、52页

^② 同^①，第499页

苏联在与东欧国家发展关系中，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但在这同时，苏联由于侧重于本国的安全和利益，也表现出大党和大国主义的行为，如，南斯拉夫因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苏联就指责它“走上了脱离反帝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和背叛工人群众国际团结的道路”，把它逐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废除了苏南合作条约。此外，苏联还力求某些东欧国家作出有利于苏联的领土变动和割让。如，匈牙利承认苏捷协定中关于捷把从匈收回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转交给苏联；波兰将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划归苏联；罗马尼亚把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割让给苏联。

与苏联战后对东欧事务倾注了全部热情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它对战后亚洲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则表现出相当冷漠的态度。早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在与美国达成划分中国和远东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时，就曾答应支持国民党政府。日本投降前夕，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把国民党政府视作合作的友好伙伴的条约，当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表明苏联并不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景。不过，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还是醒悟到了苏联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对朝鲜和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苏联也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在朝鲜问题上，苏联赞同对朝鲜实行托管。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又尽力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在越南问题上，苏联欢迎承认法国在越南利益的“越法初步协定”。这里应当说，维护苏美和苏法的某种合作，避免与之冲突的考虑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苏联与战后民族解放运动

二战以前，对于民族问题和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曾有过许多论述。斯大林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在世界各被压迫国家中，在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殖民地革命的时代”。^①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地积极地援助各被压迫民族和附属民族的解放运动。但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在每个具体情况下，都应当援助任何一种民族运动。这里所说的是要援助目的在于削弱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而不在于巩固和保持帝国主义的那种民族运动。有时候个别被压迫国家的民族运动会和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利益相冲突”。^②

斯大林非常强调，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了其领导权的条件下才能取得胜利。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最富有和最有力量的阶层，害怕本国的革命比害怕帝国主义还要厉害，因此宁愿和帝国主义勾结而不愿为本国摆脱帝国主义的解放事业奋斗。从战后直至斯大林逝世，并未见到过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特别是关于妥协的民族资本主义易于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论断有过不同于以前的修改。

但是，战后恰恰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如埃及、印尼、印度和缅甸等。由于斯大林对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根深蒂固的戒意，由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性在苏联心目中大为降低，由于已经熟谙于大国外交游戏的斯大林不愿让民族解放运动束缚手脚，妨碍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关系，所以，战后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是消极的，相反对于对殖民地实行托管，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为，这给殖民地提供了“争取社会进步的具体可能性。”^③

①、②《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206页、第8卷，第124页

③卡罗尔·R·赛维茨，西尔维亚·伍德贝《苏联第三世界关系》，布尔登，1985年，第24页

1945年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就曾提议对意大利殖民地实行托管。1947年联合国大会讨论巴勒斯坦问题时,苏联投票赞成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实行分治的协议,并第一个在法律上承认了以色列。1945年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苏联与美国都提议对朝鲜实行托管。1946年苏联欢迎《越法初步协定》。对于非洲,苏联也认为当时不具备独立的条件,而只能逐步建立自治政府。

但是,斯大林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不能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的论断,在东南亚受到了严重挑战。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独立都是在当地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取得的。

1947年的印度独立,更是清楚地反映出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与时代的严重脱节。早在1925年,斯大林在论述殖民地问题时就说,“像印度这样的殖民地,基本的和新的情况不但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而且首先在于这个阶级的妥协部分基本上已经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他们害怕革命比害怕帝国主义更厉害,关心自己的钱袋比关心自己祖国的利益更多,因此他们的两只脚都站在革命的死敌的阵营中,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来反对本国的工人和农民”。斯大林认为,“必须集中火力反对妥协的民族资产阶级”,“培养无产阶级去担当解放运动的领袖,一步一步地把资产阶级和它的代言人从这个光荣的岗位上挤下去”。^①

可是1947年的印度独立却是在国大党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完成的。囿于斯大林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理论的苏联,对此显然估计不足。当然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一般原则出发,苏联支持和欢迎印度的独立,并为之建立了外交关系。

但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印度能否保持真正的独立,苏联的态度仍然是怀疑的。1948年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刊载一篇题为《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工具》的文章,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最终会使国家成为“英美帝国主义的附庸”。日丹诺夫关于两个阵营的讲话后,印度共产党和政府的对立加深,尼赫鲁对共产党采取镇压措施,于是1949年《真理报》发表了印共谴责尼赫鲁的信,指称他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②

1950年,尼赫鲁致信斯大林和艾奇逊,建议美国、苏联和中国通过其它国家的帮助和合作,寻求朝鲜停战和最终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由于印度在朝鲜问题上的努力和它对美国的批评,苏联的对印政策又发生了急剧的转变。1951年11月,贝利亚在十月革命34周年纪念讲话中,公开赞扬了印度的反帝外交政策,苏联报刊于是发表了大量类似的文章。这清楚地反映出,由于受到斯大林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理论的束缚,苏联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的政策具有很大的摇摆性和实用主义。

总的说来,战后直至斯大林逝世,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期望并不高,支持也不积极。

* * * *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苏联历经周折终于达到了拓展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其欧洲边缘建立苏联“安全带”的目的。虽然苏联未能继续维持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关系,并且与西方处于一种冷战状态,但毕竟没有与之发生新的战争。这样基本上为本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但是这一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热衷于以其它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代价,同列强进行幕后交易,划分势力范围;它将本国的利益置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之上,把其它社会主义邻国当作维护本国安全的屏障。所有这些在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上产生了消极的有害的影响。

^① 《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124~125页

^② 卡罗尔·R·赛维茨·西尔维亚·伍德贝《苏联与第三世界关系》布尔登,1986年第29页